

亚历山大史料五种传统

陈 恒

【提要】 史料问题是亚历山大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最复杂、最吸引人的问题。亚历山大的史学史是通过史料、残篇、记忆、推测之复杂混合而逐渐形成的。这些材料有不同的风格,总体上可分为赞成亚历山大的传统和反对亚历山大的传统。具体而言,可以把亚历山大的史料分为良好传统、通俗传统、反亚历山大传统、道德传统、东方传统等五种类型。以史家的眼光来看,这些价值各不相同的史料使人们有着更多的解释与想像空间。

【关键词】 亚历山大大帝 史料 五种传统

亚历山大史料问题是古典史学最复杂的难题之一,也是现代学术争辩的主要领域之一,¹富有代表性,因此梳理这一问题对其他史料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比如基督教文献中的《四福音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史实、想像与虚构并存。现存最早的亚历山大史料是狄奥多鲁斯的著作,这距离亚历山大时代已经近三百年了;最可信的材料是在狄奥多鲁斯200年之后阿里安的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说、浪漫、激情、谣言、诽谤、逸事都逐渐融入这些史料之中,可见要甄别出真实的史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正如博拉所论,“源自现代历史学家对亚历山大之令人惊异的不同看法,与其说是由于学者心理偏爱造成的,不如说是证据本身的性质造成的”。²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复杂的个性使人们对他有不同的解释,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只有借助于史料批判的方法才能合理地重构历史事实。

现在关于亚历山大的史料主要来自五位古典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家通常被称为亚历山大史家(Alexander-historians),³他们分别是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Sicily)的《历史文库》(*Bibliotheca Historica*, 希腊语,至少有4卷是有关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记述)、普鲁塔克(Plutarch,距亚历山大已400年)的《亚历山大传记》(*Life of Alexander*)及《论亚历山大的命运或美德》(*On the Fortune or the Virtu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希腊语)、柯提乌斯(Quirinus Curtius Rufus,距亚历山大约420年)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史》(*History of Alexan-*

¹ H. D. Westlake, “Lost Histories of Alexander”, *The Classical Review*, New Ser., Vol. 11, No. 3 (Dec., 1961), p. 223.

² 关于亚历山大史料的恰当讨论和构建亚历山大生涯问题,可参阅 Eugene Borza 为 Ulrich Wilcken 的 *Alexander the Great* 所写的导言(New York, 1967), pp. ix—xxviii.

³ 见 C. A. Robinson, Jr.,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Oecumenē”, *Hesperia Supplements*, Vol. 8, *Commemorative Studies in Honor of Theodore Leslie Shear* (1949), p. 299.

der the Great of Macedonia, 拉丁语)、阿里安(Arrian, 距亚历山大约 450 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 希腊语)、查士丁(Justin, 距亚历山大约 520 年)的《摘要》(*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拉丁语)。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这些作家没有一位是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 而是很久之后才进行写作的, 不过所依据的材料几乎是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人的作品及其衍生物。因此, 要想恰当地理解、评价亚历山大, 就必需研究这些作家材料的来源, 他们是在哪儿获得这些材料的; 要想揭示亚历山大研究学术发展之缘起、发展, 就必须仔细研究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原始史料的特性。虽然古代其他作家也附带提及亚历山大, 特别是斯特拉波, 但比较零碎, 也就不属于本文的考察范围了。

这些材料有不同的风格, 总体上可分为赞成亚历山大的传统和反对亚历山大的传统。具体而言, 可以把亚历山大的史料分为以下五类: 1. 良好传统: 起源于卡里斯提尼、攸美尼斯、狄奥多图斯, 经托勒密、阿里斯托布勒斯, 再经阿里安流传下来的较为真实的传统; 2. 通俗传统: 起源于克莱塔库斯、狄鲁斯、奥奈西克里图斯、尼亚库斯以及亚历山大士兵的各种传说、故事, 经柯提乌斯、查士丁、狄奥多鲁斯加以推广, 在中世纪以伪卡里斯提尼著作的出现而达到顶峰, 混杂着较多的臆想成分; 3. 反亚历山大传统: 起源于修辞学家德摩斯梯尼的反腓力传统, 经马其顿贵族反对亚历山大的亚洲政策而加以扩大, 续之以亚历山大死后逍遥派对他的攻击, 深深影响后世的亚历山大观; 4. 道德传统: 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记》是上述三种传统综合, 但有明显的道德评判因素, 目的在于垂训后世; 5. 东方传统: 近代以来, 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学术视野的扩展、学科之间的互渗, 人们注意到更多的新材料, 这其中主要以天文志、索罗亚斯德文献为代表, 是研究亚历山大不可忽略的史料。大体如下表:

类别 时间演进	良好传统	通俗传统	反亚历山大传统	道德传统	东方传统
目击者	卡里斯提尼(汤普森把他归于通俗传统)、攸美尼斯、狄奥多图斯、托勒密、阿里斯托布勒斯	狄奥多鲁斯、奥奈西克里图斯、尼亚库斯、士兵	逍遥学派		天文志、索罗亚斯德文献
第二代	培拉的马斯亚斯、卡里亚的赫洛尼姆斯、萨摩斯的丢里斯	克莱塔库斯、 <i>The Liber de Morte</i> ¹			
希腊化时代作家及其他作家	埃拉托色尼、波里比阿、阿里安、斯特拉波、波桑尼阿、提迈根尼	柯提乌斯、庞培戍斯、特奥古斯、查士丁、狄奥多鲁斯、伪卡里斯提尼、波莱拉斯		普鲁塔克	

¹ 记述的是围绕亚历山大之死的各种事件。第一份完整的英译本, 见 Waldemar Heckel, J. C. Yardley, ed., *Alexander the Great: 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4, pp. 281—289.

良好传统 最早有关亚洲探险的记述似乎可以追溯到希波战争初期。一种在本质上记载事件的王室日志在战争期间开始出现;另一种则是在这些王室日志基础上构造出来的历史叙述。亚历山大在远征中雇佣了官方记录家,这些记录家的任务就是为后代记录亚历山大的事迹。正如小罗宾逊所说:“一种是日常事件的记录,被称作王室日志(Ephemerides),这由卡里亚的攸美尼斯(Eumenes of Cardia)和埃里斯雷的狄奥多图斯(Diodotus of Erythrae)负责。另一种是在王室日志基础上的完成的历史,是由奥林索斯的卡里斯提尼(Callisthenes of Olynthus)编撰的。”¹可见,这两种官方王室日志与历史都是在战争期间编撰的。和卡里斯提尼相比,攸美尼斯和狄奥多图斯的真正贡献并没有存留下来。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资料中都没有提到狄奥多图斯,只是通过后来的历史研究,才提到他的贡献,即使提到狄奥多图斯时,也只是作为与攸美尼斯有着共同背景提及的。

由于攸美尼斯是亚历山大的秘书,可以想像他的著作是非常重要的。普鲁塔克记载的攸美尼斯与亚历山大最亲密的伙伴赫菲斯提昂之间的冲突说明了攸美尼斯以灵活的方法转移了亚历山大对他的惩罚:“赫菲斯提昂死后不久,处于悲伤之中的国王认为与赫菲斯提昂生前意见不同的所有人现在正对他的死感到高兴,国王因此在他的行为中对这些人,特别是对攸美尼斯表现得非常粗暴与严厉,因为攸美尼斯时常与赫菲斯提昂发生激烈的争执并恶语相向。但是他(攸美尼斯)是一位非常聪明、机巧的朝臣,善于改变对自己不利的处境,借助国王颂扬朋友的激情而不断地建议各种计划以荣耀自己,并捐了许多钱准备建造他的(赫菲斯提昂)的纪念碑。”²这说明了攸美尼斯的性格,也说明了他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急躁的脾气。古典作家对攸美尼斯都有着类似的记述。因此,我们能够得出这种结论:比较灵活的攸美尼斯熟悉战争知识,王室日志的记录基本是可信的,但难免有溢美之词。

卡里斯提尼(c. 370—327B. C.)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学生。伴随亚历山大远征,写有《远征波斯史》(*Persica*)、《希腊史》(*Greek History*, 386—357B. C. 年间的史实)和《福西亚战争》(*Phocian War*)等,但仅有残篇传世。³中世纪时期,他被认为是标准的亚历山大传记作家。一般认为源于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传奇》(*The Romance of Alexander the Great*)是中世纪各种亚历山大传奇的源泉,⁴但现有的《亚历山大传奇》版本在时间上属于公元3世纪,所以一般就把该书的作者称为“伪卡里斯提尼”(Pseudo-Callisthenes),所以也有人把

¹ Charles Alexander Robinson, Jr., *The Ephemerides of Alexander's Expedition*,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32, p. 11. 关于 Ephemerides (Royal Journal) 的研究, 主要见 N. G. L. Hammond, "The Royal Journal of Alexander", *Historia* 37 (1988), pp. 129—150; Julius Kaerst, "Ptolemaios und die Ephemeriden Alexanders des Grossen", *Philol.* 56 (1897), pp. 334 ff; C. F. Lehmann-Haupt, "Zu den Ephemeriden Alexanders des Grossen", *Hermes* 36, pp. 319 ff; A. E. Samuel, "Alexander's Royal Journals", *Historia* 14 (1965), pp. 1—12 等。另, 刘家和先生把“Ephemerides”译为“起居注”, 见刘家和:《〈亚历山大远征记〉序言》,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第 i 页。

² Plut. *Eum.* II. 5.

³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 1 分册, 谢德风译, 李活校, 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第 58 页。

⁴ 见 *The Hutchinson Encyclopedia*, Helicon, 2001, "Callisthenes" 辞条。

⁵ 如“柯维的威都坎(Widukind of Corvey)……在研究 10 世纪撒克逊历史时利用了民间传说和古代歌谣, 猜测撒克逊人起源于维京人或者亚历山大大帝的士兵”。见凯利:《多面的历史》, 陈恒、宋立宏译, 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第 214 页。

卡里斯提尼归入“通俗”传统一类,¹ 笔者认为还是把卡里斯提尼归入良好传统比较合理。卡里斯提尼的《亚历山大业绩》(*Deeds of Alexander*, 叙述到公元前 331 年)没有完成, 仅有一部分残篇存留下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对伊索斯战争的描述。² 卡里斯提尼的《亚历山大业绩》和王室日志是最主要的史料, 不过都已丢失了, 但为克莱塔库斯、托勒密这类作家所使用, 而这些作家正处于所谓的良好传统与通俗传统开始的时期。这些二手作家使用着同样的官方材料, 但这些二手材料也丢失了。我们只能从狄奥多鲁斯、柯提乌斯、阿里安、普鲁塔克等这些所谓三手作家那里重建亚历山大的形象了。

在亚历山大去世后的几十年间, 两部主要的历史著作出现了。根据塔恩的说法, 服务于亚历山大的阿里斯托布鲁斯首先撰写了这种记述。后来托勒密一世撰写了他在亚历山大军中服役那段时间的回忆录。他们两人都亲历了亚历山大远征, 但都是在很久之后才撰写这些记录的。极大的可能性是, 这两人都参考了卡里斯提尼的著作。但这两部历史也丢失了, 只能从现存材料窥看一斑。尽管阿里斯托布鲁斯被认为是在托勒密之前完成他的记述, 但其著作的重要性是不能比拟于托勒密的。第二手古典材料引用托勒密著作的频率要远远大于引用阿里斯托布鲁斯著作的频率, 这表明要么这些古典作家不容易得到阿里斯托布鲁斯的著作, 要么他们认为阿里斯托布鲁斯著作的可靠性不如托勒密的著作。

阿里安在好几个地方都参阅托勒密的著作, 这说明托勒密的著作是比较权威的, 至少在阿里安看来如此。几个关键的材料如普鲁塔克和柯提乌斯都把托勒密的著作当作是非常重要的原始材料。比如, 关于公元前 333 年的伊普索斯战役, 阿里安是这样引用的: “因此那时伴随亚历山大的拉哥斯的儿子托勒密说, 追赶大流士的军队在途中遇到一条深沟, 里边都是波军尸体, 他们就在死尸上踩过去的。”³ 不清楚的是, 这些材料在提到托勒密时, 多大程度上依靠卡里斯提尼所写的官方历史。或许可以假设的是, 托勒密的事后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被用作参考材料。就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 托勒密是在跟随亚历山大远征亚洲几十年后撰写这些回忆录的, 因此可以认为他利用了卡里斯提尼的官方历史来辅助这种写作。认为托勒密或许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也是合理的。即使如此的话, 这也不会减低托勒密的回忆录作为参考材料的重要性。尽管查士丁和狄奥多鲁斯在他们的历史中都包括托勒密, 但都不把托勒密当作是一种材料, 这暗示他们在使用别的材料。

另一位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是阿里斯托布鲁斯。他可能是亚历山大父亲腓力的朋友, 伴随亚历山大远征。从没有人提到他参加过战斗, 因此他或许是一位军事工程师、建筑师或其他非军事官员。可以肯定的是, 亚历山大曾派他修复被忽略或有意破坏的居鲁士大帝墓地。他或许住在亚历山大里亚, 并在 84 岁高龄的时候发表他的波斯战争回忆录, 于公元前 301 年之后在马其顿的卡珊德里亚 (*Cassandria*) 去世。从阿里安的著作中可以知道, 阿里斯托布鲁斯对亚历山大的记述是非常重要的原始材料。其他作家也引用了阿里斯托布鲁斯的著作, 但有证据表明所引用的材料并不都是真实的。阿里斯托布鲁斯或许是亚

¹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 1 分册, 第 56 页。

² 见波里比阿批评性的引用, XII, 17-22。

³ Arr. *Anab.* II. 11. 8.

历山大忠实的崇拜者,因为就同一事件他呈现出亚历山大更加仁慈的形象。比如,所有的权威材料都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位嗜酒者,但阿里斯托布鲁斯解释说这仅仅是因为亚历山大喜欢和他的朋友呆在一起。当醉酒的亚历山大杀了克雷托斯时,阿里斯托布鲁斯说这是由于克雷托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另一个例子是,托勒密记载说亚历山大命令把公开批评他的卡里斯提尼钉死在十字架上,而阿里斯托布鲁斯却认为他是死在监狱中的。

极有可能是阿里斯托布鲁斯把 *Pothos* 这一概念引入亚历山大文献之中的。不管亚历山大取得的成就有多大——他总是一位忧郁的人物——不断地为希腊人所谓的 *Pothos* 所纠缠。*Pothos* 意味着“一种充满激情的渴望”,诡辩家阿纳克萨库斯(*Anaxarchus*)向亚历山大描述说冥冥之中有无数的世界,亚历山大悲哀地说:“有这么多世界,我甚至连一个也没有征服。”¹ 据信这是描述亚历山大内在动力的最好说法。因此,亚历山大渴望渡过多瑙河,打开传说中的戈迪亚之结,建立埃及城市,敬拜阿蒙神庙,访问奈萨(*Nysa*),攻占阿尔诺斯(*Aornus*),航行于大海或看到波斯湾,这一切都是古典作家著作中例子。这个词语或它的拉丁语形式是 *ingens cupido*,就成为描述亚历山大的标准术语,或许这个观念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 *Pothos* 也可表示渴望死亡的意思:*Pothos* 是希腊人安放在墓地上的一种花的名称,像阿喀琉斯一样,亚历山大为求盛名而宁愿早死。

阿里安约公元 87 年出生于罗马帝国内的一个希腊城市尼科米底亚(*Nicomedia*),或许在公元 2 世纪早期开始撰写历史,主要取材于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鲁斯,所代表的是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鲁斯的传统,因此,也代表了卡里斯提尼著作的传统。尽管阿里安的著作写于亚历山大 500 年之后,但对于现代读者而言,阿里安的著作或许是研究亚历山大的最重要的材料。阿里安充分利用分析的方法,想尽量得出亚历山大的真实生平;因此,阿里安给现代历史学家所带来的益处也就最显而易见,因为阿里安很清晰地辨别了他的材料来源以及这些材料的重要性。² 尽管阿里安一生辉煌,但他总是利用时间写作,题材非常广泛,包括哲学、历史、地形学、人种学以及军事方面的著作。如有关爱比克泰德的学说(八卷,现存四卷)、包含爱比克泰德谈话的 12 卷书(已丢失)、《气象学》(*Meteorology*, 已丢失)、《比提尼亚史》(*History of Bithynia*, 仅存残篇)、关于阿兰人的著作、《帕提亚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arthian Wars*)、关于军事战略的书(仅存残篇)、军事手册、关于打猎的书、关于黑海的书(25 卷)、《印度志》(讲述印度的奇闻以及尼亚库斯返航的记述)以及《亚历山大之后的事件》(*Events after Alexander*, 从拜占廷大主教福提斯的摘要中得知的,但突然中断,可能没有写完)等。

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是现存有关亚历山大的最重要的材料。主要是因为阿里安忽略了克莱塔库斯的《亚历山大史》,而使用了其他材料。在序言里,阿里安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人的记述比较可靠。因为阿里斯托布鲁斯曾随国王亚

¹ Plutarch, *Tranq.* 466d.

² 不过,阿里安在使用阿里斯托布鲁斯、托勒密的材料时也经常偏离主题,他解释说:“至于别人撰述中那些我认为值得记下而且并非完全不可靠的材料,我也采用了,作为流传下来的关于亚历山大的史料的一部分。”*Arr. Anab.* 1. 译文见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1 页。

历山大转战各地,托勒密则不但有同样的经历,而且他本人也是个国王。对他来说,撒谎比别人更不光彩。”¹ 很少没有人不对阿里安这段话留下深刻的印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阿里安选择的是正确的材料: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鲁斯是事件的目击者。

通俗传统 虽然由阿里安报道的托勒密、阿里斯托布鲁斯传统比较好,阿里安似乎掌握了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也比别人更加可靠,但应该承认,不管是阿里安的著作还是任何记载亚历山大事迹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都只有表面的价值,不能当作是完全真实的史料,因此,遵循哪种传统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也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柯提乌斯、查士丁和狄奥多鲁斯没有坚持阿里安所遵循的优良传统,也没有采取普鲁塔克以性格取胜的道德笔法,而是使用一种通俗传统,这种传统的特征就是夹杂着冗长的、善辩的演说和评论,实际上这是一个流行故事:包括浪漫的细节、令人信服的(但不正确的)的心理描写、奇异的故事等。因而现代历史学家则质疑这些记载。不过,这种通俗传统并不是完全毫无用处,表明了材料的另外一种来源,但这些来源并不能确认,必需仔细研究。尤其要特别注意查士丁这位作家,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对公元前1世纪庞培戍斯·特奥古斯的著作进行了摘要,而特奥古斯这部著作已经不存在了,并且这部著作与柯提乌斯、狄奥多鲁斯的著作极其相似,因而也就与通俗传统有某种关联。^o

通俗传统来源于奥奈西克里图斯、尼亚库斯、克莱塔库斯、狄鲁斯这类作家。尼亚库斯和奥奈西克里图斯是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人,并服务于军中,而克莱塔库斯可能是在亚历山大去世后几十年开始写作的。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些人的历史一直以来不是被斥责为谎言,[»] 就是被认为有过多轶事趣闻。哈蒙德认为狄奥多鲁斯和柯提乌斯把狄鲁斯的著作当作是希腊本土所发生事件的主要材料。^¼ 柯提乌斯、查士丁和狄奥多鲁斯似乎把克莱塔库斯的著作当作是亚历山大在亚洲那些事件的主要材料。

克莱塔库斯(Cleitarchus)是历史学家狄昂(Dion of Colophon)的儿子,狄昂写过一部《波斯史》(*Persian History*, 已丢失)。克莱塔库斯或许模仿托勒密进行历史研究,编写《亚历山大史》(*History of Alexander*, 12卷)。有人认为克莱塔库斯是可信的:“克莱塔库斯为获取印度方面的消息大概读过和使用过奥奈西克里图斯、尼亚库斯记述,克莱塔库斯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目击者的报告补充了这些当代亚历山大史学家的东西,这些人大多是大王的雇佣兵。”^½ 但塔恩在《亚历山大》第二卷中对克莱塔库斯做了如下的评述:“克莱塔库斯喜欢捏造屠杀,或者喜欢采纳所捏造的屠杀……”^¾ 对克莱塔库斯的这种评价是重要的,因为这

¹ 译文见《亚历山大远征记》,第10页。

^o 相关精彩论述见徐晓旭、王敦书:《庞培·特奥古斯的〈腓利史〉和查士丁的〈腓利史概要〉》,《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 阿里安评论奥奈西克里图斯说:“亚历山大……自己那只船的领航员叫奥奈西克里图斯。这个人后来写了一本亚历山大传记。他在本书里撒了一些谎。其中之一就是说他自己当时是舰队司令,事实上他不过是一名领航员。”Arr. *Anab.* VI. 2. 3. 译文见《亚历山大远征记》,第193页。

^¼ N. G. L. Hammond, *Three Historian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60.

^½ 参见 Waldemar Heckel 为 Quintus Curtius Rufus 之 *The History of Alexander* 所写的导言,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pp. 5f.

^¾ Tarn, *Alexander the Gre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127.

暗示有一种思想潮流,这个潮流怀疑克莱塔库斯作为一种资料的合法性。

克莱塔库斯著作的一个特点是对亚历山大心理的描写。在他看来,年轻的大王被持续不断的好运所腐化,成为一个酒鬼、暴君和谋杀者。现代历史学家并不否认克莱塔库斯所描述的这些事实,但是倾向于另一种解释。比如,根据柯提乌斯或克莱塔库斯的说法,亚历山大在他的对手大流士三世死了之后开始改变;从那时以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邪恶。虽然有许多事件可以证明这种心理发展的存在,但也可以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来进行解释,亚历山大的行为举止必须要像波斯国王那样,否则就不会得到新臣民的接受。总之,我们可以说,克莱塔库斯的著作混合了生动的描述、目击言辞和对亚历山大灰暗心理的刻画。他也喜欢叙述那些荒谬的传说,有时为保持故事的趣味性和强调心理发展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可见,克莱塔库斯的《亚历山大史》包含许多错误,有时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奥奈西克里图斯(Onesicritus of Astypalaea, c. 380—305B. C.)是著名的哲学家第欧根尼的学生。在亚历山大远征第一段时间并没有听说过奥奈西克里图斯这个人,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这个人首先出现的年代是公元前326年,这时他在太克西拉(Taxila)为亚历山大和印度贤人之间做翻译。在向南部航行期间,奥奈西克里图斯是亚历山大皇家船只的舵手;当一部分马其顿军队回到巴比伦时,他也是随队者。当他返回之后,他发表了《亚历山大是怎样被教育的》(*How Alexander Was Educated*),但遗憾的是这个文献已经丢失。许多学者认为他是不负责任的传奇小说作家,塔恩则认为奥奈西克里图斯从没有说过自己写过历史。¹可以确定的是,奥奈西克里图斯在这个回忆录里声称自己是舰队的司令,实际上并不是,这促使尼亚库斯去撰述自己的回忆录。

亚历山大同时代史料的另一个来源是尼亚库斯。阿里安简单地引述了尼亚库斯,通过阿里安我们知道尼亚库斯是亚历山大军队一支分遣队的指挥官。²查士丁在《摘要》中更加简单地引述了尼亚库斯,普鲁塔克和柯提乌斯都简略地提到尼亚库斯,但并没有把他当作材料来引用。尼亚库斯出生于克里特,在马其顿的安菲波利斯接受教育长大;他曾与亚历山大王储是好朋友,于公元前334年被任命为吕西亚、潘非利亚的总督。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时,他被招回来加强亚历山大的力量。尼亚库斯在印度时,起初只担任某种低级指挥官,于公元前326年被任命为海军将领。公元前324年他娶了亚历山大在波斯的妻子巴辛(Barsine, 363?—309B. C.)的妹妹为妻。亚历山大死后,尼亚库斯支持亚历山大和巴辛的儿子赫拉克勒斯;然而,不久赫拉克勒斯就被杀死了,尼亚库斯引退,开始撰写《印度志》。《印度志》已经丢失,但通过古典作家的引用(特别是阿里安的《印度志》),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情况。该书似乎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印度边境、大小、河流、人口、种姓制度、动物——特别是大象、军队和风俗的描述;第二部分记述的是尼亚库斯航行回家的经历。也包含一些对奥奈西克里图斯的评论,以证明奥奈西克里图斯的无能。尼亚库斯的《印度志》似乎在描述了亚历山大最后时日后就结束了。

取材于克莱塔库斯、奥奈西克里图斯、尼亚库斯著作的狄奥多鲁斯、柯提乌斯自然被归

¹ Tarn, *Alexander the Great*, p. 35.

² Arr. *Anab.* IV. 30. 5f.

入通俗传统这类。公元前1世纪狄奥多鲁斯的《历史文库》是现存最古老的有关亚历山大远征的文献，他曾在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工作过，创作时代是恺撒、奥古斯都时代。《历史文库》共40卷，其中第1—5、11—20卷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拜占廷时代的摘录中知道其他各卷的情况。内容大致是：第1卷是埃及传说；第2卷是亚述和巴比伦古代历史（以公元前4世纪克泰西阿斯[Ctesias]的《波斯人史》[*History of the Persians*]为基础）；第3卷是利比亚。接下来的三卷描述的是古代希腊人。第7卷是特洛伊战争，第8—17卷讲述的是直到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史。其中第17卷是亚历山大时代。第18—40卷的主题是亚历山大去世后的地中海世界史。该书最著名的部分或许是第11—20卷，是现存惟一的有关“古典时代”希腊的连续叙述。现代学者认为狄奥多鲁斯缺乏批评的态度，这有点夸大其辞，最新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这种看法：这位西西里作家想写出一部更容易理解的世界史，并且深谙叙事手法。他的主题以及对古代世界这些分散的文化在罗马统治之下正逐渐成为一种地中海文明的叙述是非常明确的，因而肯定也受到同时代人的欢迎。亚历山大在《历史文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毕竟是亚历山大使埃及、波斯、利比亚和希腊彼此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不考虑一些比较小的作家的话，柯提乌斯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史》是现存关于亚历山大的惟一罗马作家的作品，他也是通俗传统中最杰出的代表。柯提乌斯或许是一位军事指挥官，在罗马皇帝提比略时代官至元老院元老。公元31—41年之间，柯提乌斯创作了《马其顿亚历山大史》，在皇帝克劳狄时代发表。《马其顿亚历山大史》由10卷组成，尽管这部著作在中世纪非常流行（据说有超过100多个译本），但前2卷现在还是丢失了。所包含的内容是亚历山大登基和希腊雇佣军在波斯的首领美诺(Memnon of Rhodes, c. 380—333B. C.)之死之间的事件。现存的抄本自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军通过弗利吉亚(Phrygia)开始，最后一卷以亚历山大金棺的埋藏而结束。

还存在一些其他可以归入通常传统的材料，比如被认为源于古代晚期的材料 *Metz Epitome* 就是一例。¹ 这类著作的重要性相对较小，自然也就忽略不记了。

反亚历山大传统 马其顿的兴起使雅典内部产生反马其顿派和联马其顿派，两派之间的争论预示着将要出现的反亚历山大传统。反马其顿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德摩斯梯尼、许坡利得(Hyperides, 390—322B. C.)、莱库古(约390—324B. C.)等。自公元前351年起，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德摩斯梯尼(384—322B. C.)由于惧怕腓力扩张而发表一系列《反腓力演说》(*Philippics*, 351, 344, 341B. C.)，鼓动雅典、底比斯联合希腊世界力量抵抗腓力二世，这些演讲使他扬名希腊世界。他的演说词是有关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重要信息，也是有关马其顿历史的重要信息。虽然德摩斯梯尼预见到了危险，但为时已晚，并且起初他也没有预料到这种危险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² 亚历山大去世后，雅典人要求德摩斯梯尼联合希腊力量以摆脱马其顿的统治，但并没有获得成功，被亚历山大的将领安提帕特(Antipater)击败，最后服毒自杀。

¹ 见 Brian Bosworth, E. J. Baynham, eds., *Alexander the Great in Fact and Fi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中 Bosworth 所写的导言，他对亚历山大史料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该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有关亚历山大的论文集。

² 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德摩斯梯尼的行为遭到了联马其顿派的反对,这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政治家、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菲罗克拉特(Philocrates)、埃斯钦斯、提奥庞姆普斯(Theopompus)等。伊索克拉底(436—338B. C.)出版政治小册子——大部分以虚构的演说形式为主,以此来影响雅典的政策以及其他城邦的政策。¹他劝说腓力领导希腊人进行反对波斯的战争。伊索克拉底曾大声疾呼:“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而把亚洲的财富带回希腊。”埃斯钦斯(Aeschines, 397—322B. C.)认为腓力的目的是和平的,并于公元前330年成功地使德摩斯梯尼遭到流放,但是他本人后来也遭到流放。提奥庞姆普斯曾跟随伊索克拉底学习并成为腓力、亚历山大的朋友,他同情马其顿的态度惹恼了许多希腊人。他著有《希腊史》(*Hellenica*),时间范围是公元前411—394年,另著有关于腓力的生平《论腓力》(*Philippica*),但散漫不得要领。

随着亚历山大的胜利,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他开始任用波斯贵族,行为也越来越像一个专制君主,这种变化引起了马其顿贵族的强烈反对。亚历山大与大臣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如菲罗塔斯事件(Philotas)、处死帕曼纽(Parmenio)、怒杀克雷托斯和参拜仪式等事件。在下层方面,游击战的残酷性终于挫伤了马其顿士兵的士气,马其顿普通士兵开始公开要求返回马其顿。²

卡里斯提尼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伴随亚历山大远征。开始卡里斯提尼把亚历山大比作神,后来则成为谴责亚历山大采纳东方宫廷礼仪的主要批评家,后又怀疑参与赫莫劳斯(Hermolaus)反对亚历山大的阴谋而被处死。这促使了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逍遥派转而反对亚历山大。³这些都影响了后世对亚历山大的研究。比如公元前3世纪晚期希腊作家逍遥学派萨提鲁斯(Satyrus the Peripatetic),他曾撰写雅典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传记。他还撰写了腓力的传记,但只有部分保存下来。

可见反亚历山大传统的形成有三个来源:雅典的反马其顿派、马其顿的反对派、逍遥学派。这些派别反对亚历山大的原因、背景各不相同,但总的目的是一致的,是近现代有关亚历山大争执的渊藪之一。

道德传统 普鲁塔克(46—120年)虽没有亚里士多德敏锐、奥古斯丁深奥,却是中世纪早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影响在生前就非常广泛了,否则是不可能担任德尔菲祭司并被塑以雕像的,⁴他以通俗的语言向希腊、罗马世界那些不具备哲学素养的人讲解深奥的哲学问题,著述宏丰,所写著作多达200多本,⁵主要由道德论集和人物传记两部分组成。

道德论集包括83篇文章,内容比较广泛,但主要研究的是道德问题。比如有这样一些题目,论迷信、抑制愤怒、聆听诗歌的艺术、怎样知道是否向美德进步了、对善行的乞求,等等。普鲁塔克的人物传记实际上是一种实践的道德论集,正像他自己在亚历山大与恺撒平行传记的序言里写道:“我写的并不是历史,而是传记;最辉煌的业绩往往并不暗示德行或恶

¹ Philip P. Wiener, ed.,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 Influence of Ideas On Ancient Greek Historiography” 辞条,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73—1974, p. 504.

² 皮埃尔·布里昂:《亚历山大大帝》,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18页。

³ 见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Callisthenes” 辞条。

⁴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Plutarch” 辞条。

⁵ *Who’s Who in the Roman World*, “Plutarch” 辞条, Routledge, 2001.

行,实际上像一句话或一个笑话这样一些小事常常揭示了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而不是死亡了成千上万人的战争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普鲁塔克记述希腊人、罗马人的业绩,并加以比较(23篇平行传记,4篇单独传记)。¹ 比如雅典、罗马的奠基者提修斯、罗慕路斯的平行传记就以简短的结论来透视各自的性格特征,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并不仅仅是有趣的人物传记,而是可仿效的道德楷模,以激励读者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可见普鲁塔克是通过人物性格来表达寄托、扬善贬恶,以宣传自己的伦理思想,可谓是西方“春秋笔法”之始祖,因此带来的后果是疏于考证,也缺乏批判思想。普鲁塔克的目的是从亚历山大传记中得出道德训诫,自然也就省略许多细节和军事评论,也就是说普鲁塔克不会就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衰亡与罗马共和国的衰亡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而是提供一些带有道德蕴意的逸闻趣事。因此,人们读到的亚历山大传记是一些短小故事的汇集,由这些故事来展现亚历山大的美德与恶行,让读者遵循或避免。在历史学家看来,普鲁塔克的效用是有限的,与其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伦理学家、思想家。

塔恩认为,普鲁塔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理解亚历山大的生平:“有特色的部分(亚历山大本人和他的个性就是这个有特色的部分)构成了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记》的主旨,这种主旨要好于其他‘通俗’文献。这个部分的大多数是在其他地方看不见的,并且大多数也是极其有价值的,尽管也有一些故事是不真实的、愚蠢的。”² 尽管普鲁塔克的著作有时很费解,但他使用了和阿里安类似的材料,对这些事件冗长的描述为读者留下了生动的印象,虽然很有趣,但必须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

普鲁塔克笔下亚历山大的道德形象在《论亚历山大的命运或美德》中得到鲜明阐述:亚历山大把文明带到了野蛮世界,并使这些蛮族开化;亚历山大以一种与众不同但非常有效的方法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亚历山大是实践的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塔克是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亚历山大。

总之,普鲁塔克的道德论集和人物传记简洁、典雅、深刻、沉着、机智,让读者心旷神怡,必有所得。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整个西方历史长河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比如意大利的彼得拉克、薄伽丘,英国的莎士比亚、培根,法国的拉伯雷、蒙田、卢梭、拿破仑,德国的歌德、贝多芬……因而也极大地影响了一般民众的看法。不过普鲁塔克的这种道德传统是一种潜流,左右着一般民众对亚历山大的看法,犹如《三国演义》影响着中国民众对三国历史的看法。

东方传统 自1889年德国耶稣会士埃平(J. Epping, 1835—1894年)、斯特斯麦尔(J. N. Strassmaier, 1846—1920年)出版楔形文字天文学文献《巴比伦天文学》(*Astronomisches aus Babylon, oder, Das Wissen der Chaldäer über den gestirnten Himmel*)以来,人们越来越

¹ 其实传记之中还有一位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的传记,我们依据习惯称之为《希腊罗马名人传》。

² Tarn, *Alexander the Great*, p. 297.

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记》包含许多亚历山大孩提时代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取材于一本叫《亚历山大的教育》(*Alexander's Education*)的书,该书由一位名叫 Marsyas 的马其顿人写的,他曾陪王储亚历山大读书(或许是托勒密对手 Antigonos 的儿子)。另据郭小凌先生说,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记》至少引用了 24 位作家的作品。见郭小凌:《论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史学意义》,《史学集刊》1995 年第 3 期。

注意到楔形文字天文学资料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纽阁伯(O. Neugebauer, 1899—1990年)于1955年出版的《天文学楔形文献》(*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 萨赫斯、亨格(A. J. Sachs & H. Hunger)在1988—2001年间出版的《天文志》(*Astronomical Diaries*)使人们可以更加便利地利用这些古代东方文献来研究历史了, 这些材料特别是在年代学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不考虑一些铭文、演说词的话, 那么有关亚历山大惟一主要的、同时代的材料便是《巴比伦天文志》(*Babylonia Astronomical Diary*)。它包含逐日的天象记录, 也包含一些其他事件, 如幼发拉底河的水平线、气象、物价、有关巴比伦及其庙宇的事件以及政治事件等。毕竟, 在古代人们认为天象是重要政治变化的预兆。

19世纪与20世纪, 考古学家在伊朗、美索不达米亚挖掘了数百万片楔形文字泥版, 当然不可能把这些泥版全部整理、发表。因这一原因, 《天文志》还存在大量的空白。无论如何, 它包含着非常有趣的消息, 比如当亚历山大军队在巴比伦时的商品价格、亚历山大去世的具体时间(公元前323年6月11日)等。然而, 来自《天文志》的最让人感兴趣的消息是与发生在公元前331年10月1日的高加美拉战役相关的记录。《天文志》上记载的是波斯士兵士气受挫, 他们在战争期间抛弃国王逃逸了。这与我们在古典作家狄奥多鲁斯、柯提戍斯、普鲁塔克、阿里安那里看到的记载完全相反: 国王丢弃了士兵。很容易解释这种差异。战争发生在满是灰尘的平原上, 不可能看清所发生的一切。在傍晚的时候, 马其顿人发现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宰者, 试图重建所发生的一切, 并假想大流士已经逃逸了。这场战争的官方叙述是由卡里斯提尼记载的, 而狄奥多鲁斯等人的叙述就来自这份官方记录。现代学者对这场战役的重构忽略了《天文志》, 只是采用了马其顿人的说法, 不是战役的真实面目。

不过, 由于缺乏经费、局势混乱、考古学家与亚述学家属于不同学科等原因, 使得许多泥版文书不能发表。最明显的例子是波斯波里斯筑城泥版(*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 其数量据估计达20000—30000片之多,¹ 但仅仅发表了一小部分。此外, 源自尼普尔、乌鲁克、乌尔、苏萨等著名地区等待发表的泥版, 其中大量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塞琉古王朝时期。可以推测以后会发现更多的类似材料可以更正我们先前的历史记录。因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今后要研究亚历山大就必须学习巴比伦语或波斯语。

《索罗亚斯德文献》(*Zoroastrian Texts*)是另一个有关亚历山大记载的东方文献。在索罗亚斯德教徒眼中, 亚历山大是“该诅咒的”(guzastag), 为安格拉·曼纽(恶灵), 他是“杀麻葛者”(mwzrt),² 他在公元前331年烧毁了以金字书写在牛皮上的圣书《阿维斯塔》(*Avesta*)。³ 这个说法存有疑问, 因为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没有成文的《阿维斯塔》, 那时的宗教传统是口述传统。在这些学者看来, 成文《阿维斯塔》不可能在萨珊王朝(约224—651年)之前产生, 也就是说可能在公元224年之后产生, 甚至更晚。实际的情况可能

¹ Mark B. Garrison and Margaret Cool Root, *Seals on the 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ablets, Volume I: Images of Heroic Encounter*,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2001, p. 3.

² 转引自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133页。

³ Willard G. Oxtoby, *World Relig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3.

是,在亚历山大时代,索罗亚斯德教徒只有不多的成文文献,且亚历山大试图毁灭这些文献。

尽管口述传统可能是极端的不可靠,但忽略它们也是不明智的。犹太人的口传律法《密西拿》(*Mishna*)与这一情况非常相似。《密西拿》是以著名的学者犹太纳西(*Judah Ha-Nasi*, 135—219年)为首的拉比们在公元200年编撰成的,这已是辉煌的法利赛教师比如希勒尔(*Hillel*)去世之后很久了。一代代人以来,法利赛人的这些学说一直是口传的。不过却没有现代学者宣称,对于研究希勒尔的学说来说,《密西拿》是不可靠的资料。这也符合索罗亚斯德教传统,尽管这些材料包含时代错误和奇迹故事(像《密西拿》一样),但也极有可能包含一些可靠的信息。当然这些文献都是间接史料,使用时务必多加小心。不管怎样,这些史料在重构亚历山大历史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

总之,史料问题是亚历山大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最吸引人的问题。亚历山大的史学史是通过史料、残篇、记忆、推测之复杂混合而逐渐形成的。虽然人们不应该把通俗的材料当作是无用的,其最大价值在于,它可以纠正阿里安所依据的有偏见的材料,比如失控、酗酒等。但就史料的可靠性而言,阿里安的著作是最重要的。克莱塔库斯、狄鲁斯构成了通俗传统的大量内容,这已经表明它们的问题要大大多于它们的价值。因此这些通俗材料的作用和阿里安、普鲁塔克的著作相比,其质量也很有限。当代学者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看法,因而对这些材料进行详细的讨论将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每一种史料都呈现不同的亚历山大,并以细节加以描述。阿里安笔下的亚历山大讨人喜欢,柯提戍斯的亚历山大比较灰暗,普鲁塔克则兼收并蓄。所有的材料都包含相当多的幻想成分,就像斯特拉波所说“所有撰述亚历山大的人喜欢奇迹甚于喜欢事实”。¹无论如何,史料告诉我们的越少,也就留给我们越多的解释与想像空间。

(作者陈恒,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邮编:200234)

(责任编辑:于沛)

(责任校对:张旭鹏)

¹ Strabo, 2. 1. 9.

The Five Traditions in the Sourc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Chen Heng*

The sources are a main problem in Alexander the Great studies, but also the most complex and most attractive. The historiography of Alexander is a complex mix of evolution through source, memory, speculation. These sources have different styles; on the whole,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pro- Alexander tradition, anti- Alexander tradition. Specifically, these sources can be divided into good tradition, popular tradition, anti- Alexander tradition, moral tradition, and the oriental tradition. In historian's view, the value of different sources can make people have more room for imag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Wang Chuanshan's Statu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Xiao Pinghan*

Wang Chuanshan (1619- 1692) quested actively for the development law of Chinese history, wrote lots of historical works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part from referring to historical literature, he probed history to find what had caused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historical events. He inherited part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developed a new historiography, which played somewhat the role of transition. However, he still took the viewpoint of destiny and held the theory that everything was controlled by God, so his historiography fell in essence into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Micro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Guo Yanjun*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by criticizing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Engl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changed the object of philosophy to realistic human life. The study of realistic human life is divided into macro and micro dimensions. The macro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een widely focused, and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and everyday life is still neglected. The study of micro- history will enrich the research field, and extend contents of investigation.

The Commentary on the Polemics of Division and Basic Clew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Liang Jinghe*

The problem on the division and basic clew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blems. The exploration to this problem makes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not only recognizing process and character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but also developing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There arose two commentary climaxes on this problem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which propelle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history theory. This article combs and reviews the basic state of the two polemics, for the purpose of settling the exploration course and construct academic base for extended research.